

清真寺与伊斯兰经济文化的生成及其发展

马丽蓉

起步于欧卡兹集市和克尔白神庙的阿拉伯商人，遵奉《古兰经》和圣训的经济理念，在每年的朝觐商贸与海外贸易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阿拉伯民族“经商、信教”的特有文化传统；清真寺和集市的空间并存，折射出集市上的经济活动要受到清真寺伊玛目所宣传的伊斯兰经济思想的规范和制约的现实存在；目前的伊斯兰经济文化也面临着如何生存与怎样才能更好发展等切实挑战。我们可借助伊斯兰教法创制的自我更新机制，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努力，推动伊斯兰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探究利息理论在现实操作中的变通策略及实施办法、寻求寺院经济融入国家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路径并调动清真寺在伊斯兰经济文化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清真寺与集市 伊斯兰文化 伊斯兰经济生成模式 宗教伦理型经济

作者：马丽蓉，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阿拉伯世界研究》副主编。

一、欧卡兹集市·克尔白神庙·陆海贸易： “经商、信教”文化传统的形成

自古以来阿拉伯民族就以重商善营而闻名于世，《古兰经》里也出现了“商业”、“商人”、“经商”、“赢利”、“亏本”等经济语汇并多次提及麦加古莱氏人的经商活动。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中，阿拉伯民众从事着各类商贸活动并在半岛内逐步形成了许多集市，其中尤以欧卡兹集市最为著名。自前伊斯兰时代起，半岛各部落的民众就在每年11月相约会聚在位于麦加南山谷地带的欧卡兹举行为期20天的集会，或交换货物、买卖奴隶，或排解纠纷、比赛诗歌，或互换有无、攀比夸耀……每逢禁月，先知穆罕默德常与家人到欧卡兹集市聆听诗人朗诵悬诗，神父作布道演讲，犹太教、基督教及偶像崇拜者的公开辩论，当然还能多方面见识汇聚于此的各路商人的贸易活动。在他12岁时就曾和伯父阿卜·塔利卜随商队去叙利亚经商，青年时又受雇于麦加富孀赫蒂杰的驼队外出经商，终因出色业绩和高洁品行赢得肯定。欧卡兹集市虽为自由市场，但交易双方却不必向任何人缴纳贸易税，其他集市则必须向当地部落酋长缴纳贸易什一税。这是因为欧卡兹属于台米姆部落的地段，但实力强大的古莱氏人却不允许台米姆族的酋长贵族向参加欧卡兹集市贸易的商人征收什一税。由于欧卡兹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研究课题（06JJDGJW007）、博士后国家基金（20090450718）及上海市社科基金（KB159079）资助成果之一。

靠近麦加，尤其在象战之后随着麦加实力的不断崛起，极具经营意识的古莱氏人（“古莱氏”一词演变于“格尔什”，即含“钱币”之意，古莱氏人素以经商闻名，甚至“全民皆商”。）一方面鼓励各部落民众参与集市贸易，以便从中获利。另一方面，掌管克尔白圣庙的古莱氏贵族可利用集市交易的机会与各部落加强联系，吸引更多信众在集市后前往麦加朝拜克尔白圣庙。结果，随着欧卡兹集市的日益兴隆，麦加克尔白圣庙的地位亦随之提高，每年三次赴麦加的朝觐商队贸易更因“如此众多的人员活动”而“十分有利可图”^①。古莱氏人从经济、宗教、政治等方面不断获益，6世纪中叶，随着也门经济文化的衰落，麦加取而代之。6世纪后期，麦加人以投资入股的方式组成商队，开展对外贸易。可以说，在6-7世纪时，麦加就成了阿拉伯半岛上无可争辩的经济、宗教、政治等中心，被誉为阿拉伯人谋生与致富之途的“汉志商道”就必经麦加。“祖白达大道”就是这条朝觐商路上的一个典范。此路延伸近900英里，穿越伊拉克沙漠，跨过内夫得沙漠，最后抵达麦地那和麦加。每隔15英里左右，或每距离一天的路程，都会有人工修建的蓄水池、商队客店和饮食店。在这条大道上，“每年聚集起来前往麦加的朝觐车队是一道伟大的风景，而且也是前现代的穆斯林世界里一次伟大的经历和体验。”^②

尽管伊斯兰教鼓励穆斯林远行经商（《古兰经》16：14），但阿拉伯民族在对外扩张的百年间却无暇顾及商业，通晓阿语、波斯语、法语和希腊语的犹太商人则在东西方各国的经贸往来中不断获利，一直到阿拔斯王朝前期哈里发哈伦·拉希的时代，随着阿拉伯帝国对外扩张之势的趋弱，内外社会环境趋于安定，才逐步扭转了犹太人的商业垄断地位，形成以巴格达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陆上商道和海上贸易。尤其是海上贸易西路与叙利亚关系极为密切：每年有大批叙利亚穆斯林取道约旦前往麦加参加朝觐，当他们在麦加朝拜了禁寺返国时，绝大多数人又顺道赶往耶路撒冷去参拜远寺。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享的圣城耶路撒冷，叙利亚的朝圣穆斯林便接触到来自西方各国的异教徒，并为之进行信息沟通、商贸洽谈、海运合作等，穆斯林商人在地中海的贸易活动达到了高峰，最终以其活动范围之广和影响力之大而扭转了被异教徒主导的经贸现状。^③阿拉伯史上最著名的航海家艾哈迈德·伊本·马吉德·纳吉迪15世纪下半叶在他的科学论文中写道，红海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海，而人们在红海的航行却比在地球任何其他海洋都要多。按照伊本·马吉德的说法，人们之所以使用红海是由于附近有真主古代的居所，是由于先知的朝觐，也由于希贾兹的居民和每年朝觐商队的信士们需要得到食品与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身处半岛腹地的希贾兹几乎全为荒漠，西南信风携带的雨水给也门和阿曼等国带来了繁荣的农业，埃及运送谷物的船队带来了尼罗河的礼物，再加上来自印度洋等其他地区的跨洋经贸往来，均成为在两大圣寺搭起的精神帝国中心所创造的伊斯兰“朝觐奇迹”的社会必要条件。因为，只要穆斯林保持着对麦加和麦地那的忠诚，朝觐者就能从周围四个切点汇聚于红海。每年多得惊人的朝觐者的旅行和健康都得借助于能够运送数以百计乘客的海船、骆驼商队、商号以及贸易集市。^④可以说，从阿拉伯部落民众朝拜克尔白圣庙到半岛内外世界各地穆斯林数百万的大规模朝觐，穆斯林精神王国不仅满足了每个朝圣穆斯林的信仰诉求，还为汇聚在三大圣寺的穆斯林商人提供了难得的商机，有力地促进了跨洋贸易、陆路经济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结果，麦加与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开

①②④[英]弗朗西斯·鲁宾逊 主编，安维华、钱雪梅译《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136-137、139、124-125、139、75、147、166、176、142、146页。

③纳忠等《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142页。

罗一并成为连接中东、非洲、印度和中亚等地的跨地域贸易中心，“为中东朝觐商队供应必需品的商人和交易者也经营赴印度、中亚和中国的跨大陆的贸易。”^①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于公元851年（唐玄宗大中五年）来广州经商归国后著成《苏莱曼游记》“中国商埠为阿拉伯商人麇集者，曰康府（即广州），该处有回教教师一人，教堂一所……”^②李肇还在《唐国史补》中记载了主持清真寺祈祷、处理穆斯林诉讼的蕃长主领商务活动的珍贵瞬间。^③

宋代的穆斯林社区仍称蕃坊，亦有“蕃巷”、“蕃人巷”等别称，且坊内建寺。1009—1010年（伊历400年）阿拉伯穆斯林在泉州城东南创建了艾苏哈卜清真寺，也就是圣友寺；1131年（宋绍兴元年）波斯希拉福冈人纳只卜·穆兹喜鲁丁也在泉州城南建立了清真寺……正是由于泉州城南穆斯林社区随着清真寺的不断增建、胡贾短期或长期驻留人数的日益增长，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的繁荣发展。^④

可见，在伊斯兰教由阿拉伯半岛走向世界的“文明化”过程中，阿拉伯商人在对外经商的实践中，从“访问麦加并在克尔白绕行做功”的朝觐之路上的沙漠公共工程建设，逐渐发展到海外贸易中的跨地域商人保护问题，穆斯林商人的汇聚地或落脚点的建成已成为必然。而伊斯兰教素有聚礼之制，穆斯林每逢聚礼日必于清真寺聚集礼拜。况且以穆斯林商人之力修建一座清真寺自不成问题，伊斯兰教信仰维系下的商品经济团体的出现便以清真寺在世界各地的出现而显示出伊斯兰文明化的最初足迹：“唐代阿拉伯、波斯穆斯林来华之目的在通使、经商，并非传教。但他们是伊斯兰文化的载体。他们不但带来了中亚、西亚的香料、珠宝、犀象、药材，也带来了伊斯兰精神文化的信息。”^⑤

610年“精明能干的商人穆罕默德从希拉山洞修行出来，陆续用优美的散文‘公布了安拉的一系列启示’，即《古兰经》，其中包括经济方面的命诫。根据启示精神，穆罕默德又在创建、发展伊斯兰教的过程中对许多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后来被他的弟子整理、汇编为圣训，其中包括许多有关经济问题的看法。”^⑥因此，先知穆罕默德以其成功的经商经历和执著的信仰追求而成为阿拉伯民族“经商、信教”文化传统的个体典范，起步于欧卡兹集市和克尔白神庙的阿拉伯商人则在经训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借助朝觐商路与海外贸易又将这一文化传统予以传承和弘扬。

二、“寺市并存”·穆斯林社区·伊斯兰城市： 神俗两重生存环境的演变

“经商、信教”的文化传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穆斯林不断追求“两世吉庆”的生存目标，清真寺与集市的并存则最大程度地兼顾了穆斯林神性与俗性的双重诉求，亦即，在大清真寺完成拜功（每日5次礼拜 / 每周一次会礼 / 每年数次节庆礼拜）的穆斯林随即赶往集贸市场经商、购物、制作各类小商品等，寺与市并存便成为穆斯林聚居区的基本要件。在中东和北非地区，被穆斯林常用来特指集贸市场的巴扎多围绕一个聚礼清真寺或一座城堡

①[英]弗朗西斯·鲁宾逊 主编，《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第136—137、139、124—125、139、75、147、166、176、142、146页。

②张星娘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01页。

③④杨怀中 余振贵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6、592页。

④祝穆：《方輿胜览》，转引自杨怀中、余振贵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第72页。

⑥刘天明：《伊斯兰经济思想》，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而建，并由此形成国家的政治、文化及经济中心，甚至有人认为“巴扎对近东城市而言是惟一有特色的标准，它被当作伊斯兰文化遗产”。正是由于巴扎和清真寺之间存在着如此密切的关联，城市活动就常以大巴扎和聚礼清真寺为原点向外辐射，并根据经济活动重要性的程度不同而排在各自的圈内，货币兑换市场位于中心位置，且在习惯上都无一例外地接近大清真寺。^① 不仅如此，在巴扎和大寺并存的特定社会空间内还滋生出不同的伊斯兰亚文化，如新疆伊斯兰文化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就和著名的艾提卡尔大寺与西北最大的南疆大巴扎的并存有关，清真寺里虔敬肃穆的颂主赞念与大巴扎上喧嚣热闹的公平交易彼此呼应、互为因果，形成融有维吾尔等民族传统、新疆地域特色以及突厥文化成分的、有别于内地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另一种中国伊斯兰亚文化^②。

具体而言，“寺市并存”大体表现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寺市相邻”型，被誉为“世界典范广场”的伊朗伊斯法罕的伊玛目广场就是此类的典范。据记载，为扭转萨法维王朝的衰微命运，阿拔斯国王实行伊朗式重商主义政策，采取限制通货外流、扶持包括丝绸业在内的本国工业等举措，改善了国家的军事结构并促其经济繁荣，扩大和巩固了萨法维王朝的权威性统治，17世纪重建伊斯法罕城就是最好的明证。像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布尔一样，该城也包含宗教建筑与王室建筑相依共存所呈现出的优美总体效果^③，伊玛目广场应运而生，并成为该市的标志。广场始建于1612年，面积达8.4万平方米，东西南三面分别耸立着各具建筑特色的罗特夫拉清真寺、阿里考普宫（可从此处进入王宫，亦可进入观赏各种庆典仪式的亭台）和伊玛目清真寺。四面拱廊各开一扇大门，分别通往伊玛目清真寺、国王私人礼拜室（罗特夫拉清真寺）、阿里考普宫和加萨里亚市场。广场上举行过集会、马术表演及马球比赛等，广场四周的集市上是美不胜收的商店和作坊。因此，伊玛目广场因宗教（罗特夫拉清真寺）、政治（阿里考普宫）、经济（集市）和民间（伊玛目清真寺）四大社会基本要素的有机结合而囊括了阿拔斯国王统治时期的时代风貌，是萨法维王朝阿拔斯一世将伊斯法罕作为国家首都和经济中心的象征性表达，也折射出当时“人们对于人性和神性、生活与信仰、此岸与彼岸、终极与美的一揽子的感受把握”，^④ 第二类是“市中含寺”型，除设立商行店铺外，伊斯兰国家的重要集市内还设有客商聚会甚至礼拜之地，如叙利亚著名的哈密迪亚市场不仅东西相连于宗教、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心的倭玛亚大清真寺，还内置专供摊主和游人礼拜的小清真寺，成为“市中含寺”的典范。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有顶蓬集市被誉为世界最大的有盖市场，早在19世纪的时候就拥有4000多家商店、2000多个作坊和500多个小摊位，内配一些规模不等的清真寺、祈祷室、仓库和喷泉等设施，至今仍是伊斯坦布尔古城最大的商贸重地和穆斯林汇聚处；第三种是“寺中蕴市”型，据记载，在不影响正常礼拜的前提下，历史上的一些清真寺也被允许进入寺内开展某些小商品交易，寺院经济的存在又凸显出清真寺已然具有隐性经济实体的基本属性与功能，朝觐经济的发展更是广义上“寺中蕴市”的典范。据报道，每年世界各地的数百万人朝觐伊斯兰圣地，有力拉动了沙特的经济发展，仅每年的朝觐收入约占其GDP的4%，朝觐期间的各种活动又为沙特人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朝觐者不仅拉动了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三大圣寺所在城市的朝觐经济，还借助朝觐这种特定的宗教文化活动和穆斯林大集结的良机开展跨国贸易，加深国际交往。因此，三大圣寺，既是

①车效梅：《中东中世纪城市的产生、发展与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72-73、78、69页。

②杨怀中、余振贵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第54、56、592页。

③[英]弗朗西斯·鲁宾逊主编《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第136-137、139、124-125、139、75、147、166、176、142、146页。

④王蒙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1/22/content_7467471.htm。

宗教祈祷与纪念先祖的祭祀场所，也是文化交流、商贸洽谈的平台，更是各国开展民间外交的政治舞台。

伊斯兰教强调个人隐私^①，所以私人住房都用单调外墙完全包围，私宅常成为幽闭处所，且有三面墙与邻居共用，第四面墙又完全与主街道隔开，绵延不断的泥墙联结成了特定的居住区，“每一个小区里居住着同质性的社团，维系社团成员的纽带是共同的宗教、族裔或职业。”^②穆斯林的住房在本质上受制于伊斯兰世界普泛存在的两大关注的深刻影响——“家庭所拥有的免受邻居和政府干扰（在不炫耀不道德行为的前提下）的权利，以及伊斯兰教法律和穆斯林对妇女态度偏好的影响。”^③与穆斯林封闭而拥挤的居住区相距不远的则是向公众开放的公共场所，清真寺和集市，既折射出伊斯兰文化的“两世并重”观，又对穆圣关于“穆民确如建筑物的砖块，彼此牢结在一起”^④这一教诲作了独到的诠释，穆斯林的两世诉求就被表达得如此若即若离，圣性与俗性、彼岸与此岸便得到了形象生动的概括。如唐代广州也出现了这样的穆斯林社区，亦即“番坊”，在蕃人中挑选并由皇帝任命的蕃长实为唐朝的地方官，身兼行政、司法、商务、外交等职务外，还负责宗教事务。

基于宗教认同基础上结成的穆斯林社区又成为伊斯兰城市的基本构成单位。中东伊斯兰城市出现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伊斯兰教鼓励贫富共处，“每个富裕的穆斯林有责任与穷困的人生活在一起，并使他们避免饥饿和穷困。同时大家庭结构使富人也有义务供养穷人，以免亲属由于贫困可能出现的困境。”^⑤二是“宗教和民族的多样性既是伊斯兰城市的特征之一，也是居民区形成的主要原因。”亦即穆斯林社区具有鲜明的宗教特征，建立此类社区的动机是“渴望加强其宗教或民族集团的凝聚力以有利于自己的宗教仪式执行和文化传播。”^⑥因此，早在中世纪的穆斯林就认为，伊斯兰城市“具有两个焦点：星期五聚礼清真寺与市场。它很能说明穆斯林对政体的这种看法：他们惹人注目地不把宫廷或政府机构列为城市的必要因素。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认为，政府是外部力量，个人生活领域要与之保持疏远。由于存在不安全感，致使人们更加有力地强调社会生活中关系较为紧密的一些领域，转向住区、邻居、小集团、家庭和对个人的忠诚。”^⑦在穆斯林看来，“依照神圣立法者严格的意图，城市社会除了宗教制度外不能有任何制度——因为宗教贯穿于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每个服从神圣立法者的愿望和服务于支撑和赞助这个愿望而形成的共同结构，是伊斯兰城市最显著的特征。”^⑧因此，“伊斯兰教给中东城市社会打上了鲜明的烙印，不仅影响家庭和个人的关系，城市的外在结构、政府和政治结构模式，而且商业交易方式也要按宗教伦理规范进行。”^⑨从某种意义上看，早经商穆圣生活在一个商队的城市麦加是“阿拉伯半岛商队贸易的联络站和对克尔白圣庙朝拜之地。”在他迁徙到麦地那后创建了库巴清真寺——“成为宣传宗教、巩固宗教、团结教众的中心，先知在此建立了穆斯林社团的基础和组织。而穆斯林社团赋予麦地那基本制度，麦地那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模范的伊斯兰城市，它成为第一批

①马坚译《古兰经》（24：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③④[英]弗朗西斯·鲁宾逊 主编《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第136-137、139、124-125、139、75、147、166、176、142、146页。

④穆斯塔发·本·穆罕默德艾玛热编《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⑤Masoud Kheirabadi, *Iranian Citie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ustin, 1991, p. 81.

⑥⑦车效梅：《中东中世纪城市的产生、发展与嬗变》，第72-73、78、69页。

⑧R. B. Serjeant, *The Islamic City*, UNESCO, Paris, 1980, p. 14-17.

建城者参考的对象,就像在以后的世纪中它一直是作为穆斯林法律的制定者和统治者的行为模式的参考对象一样。”^①由此形成伊斯兰城市化的两个明显特征“伊斯兰的宗教与文化表现最后都集中于城市”和“社会构成呈现非同寻常的多样性与异质性。”正因为如此,“伊斯兰征服者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基督教堂占优势的城市里找一个穆斯林信徒礼拜的地方。”^②大马士革、开罗以及巴格达等著名伊斯兰城市的历史经验便是例证,人们从成为这些城市地标性建筑的清真寺文化场域获得了“清楚明白的伊斯兰的感觉”。事实证明,“伊斯兰教在建立城市社会上所取得的成功与坚持《古兰经》是相关的,《古兰经》或者通过对历史的回忆,或者通过与人类团体相关的有寓意的事件,来加强人类团体即国家和城市,传达神圣的消息,没有人否认启示。”^③“没有一个城市能够离开市场而存在。伊斯兰城市也不例外。从公元7世纪至10世纪,阿拉伯人和皈依的穆斯林从古代伊朗人、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继承了他们活跃而繁荣的城市传统,但同时又赋予它一种特殊的活力”而“成为穆斯林城市发展的组成部分。”^④清真寺和集市的并存成为伊斯兰城市的中心,相对独立的宫殿与较为隐蔽的穆斯林居住区则与城市中心互为辉映,由此形成城市的基本社会格局:宗教中心(清真寺)、政治权威(宫殿)、市场(经济中心)以及居民区(民间社会),象征着政治与宗教的统一、圣性与俗性的并存。

事实证明,在“寺市并存”基础上形成了穆斯林社区,以不同的穆斯林社区为基本单位又建成了伊斯兰城市。其中,能否最大程度地满足穆斯林神性与俗性双重层面上的生存诉求,又成为穆斯林生活环境变迁的根本生成原则。清真寺和集市分别成为神性与俗性的象征符号,二者的关系就不只在空间上的并存,更多还在于集市上的经济活动要受到清真寺伊玛目所宣传的伊斯兰经济思想的制约,进而彰显出伊斯兰经济文化与穆斯林特定生存环境间的内在关联性。

三、生成模式·发展态势·面临挑战: 宗教伦理型经济文化的生成及其发展

圣训中“信赖真主,同时拴住骆驼”的寓言,折射出阿拉伯民族的“在务实中信仰,在信仰中务实,把信仰和务实精妙地交融化合为一体”^⑤的生存智能,《古兰经》中更渗透着“两世吉庆”的处事策略:

“信道的人们啊!当聚礼日召人礼拜的时候,你们应当赶快去纪念真主,放下买卖,那对于你们是更好的,如果你们知道。”(62:9)

“当礼拜完毕的时候,你们当散布在地方上,寻求真主的恩惠,你们应当多多地纪念真主,以便你们成功。”(62:10)

“商业不能使他们疏忽而不纪念真主……”(24:37)

即使是充满世俗色彩的经商营生也被包含在神圣信仰的追求当中:《古兰经》号召穆斯林应该放下经营买卖及世俗活动,走进清真寺作聚礼日的礼拜,但短暂仪式结束后,立即就能恢复正常交易活动,聚礼日也因此常成为生意兴隆之日;鼓励穆斯林积极谋求生计,进行市场交易,反对游手好闲与不劳而获;禁止非法牟取暴利,力避贪财欺贫,在敬畏真主的前

①R.b.Serjeant, *The Islamic City*, p.15.

②④[英]弗朗西斯·鲁宾逊 主编《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第136-137、139、124-125、139、75、147、166、176、142、146页。

③R.B.Serjeant, *The Islamic City*, p.17.

⑤高惠珠:《阿拉伯的智慧:信仰与务实的交融》,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8页。

提下公平交易。在重大节日里,更应散财济贫、扶助弱势……这些经商原则无不闪耀着信仰的光芒。因此,他们既可在身处集贸市场的清真寺里虔诚颂主,又可在清真寺旁的集市上公平交易,神性与俗性如此水乳交融实属罕见,就连来自基督阵营的外交家都叹服。^①

正是在“两世吉庆”观的影响下,清真寺与集市并存,构成了穆斯林聚居空间的核心,进而成为伊斯兰经济文化的基本生成模式:阿拉伯部落每年禁月在欧卡兹集市与克尔白圣庙的经商与朝拜传统影响到穆斯林社区的构建,由若干穆斯林社区所形成的伊斯兰城市建制也难脱神性与俗性生活的双重功效,清真寺在推动阿拉伯民族由动荡分散的游牧生存态转入“围寺而居”的定居生活的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清真寺诸多社会功能尤其是宗教与社会经济功能的相互制动,促进了伊斯兰经济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由“寺市并存”这一基本生成模式所形成的伊斯兰经济文化又呈现出“依寺辐射”的发展态势:一是随着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扩大,寺院经济将成为国家乃至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在宗教复兴思潮的影响下,伊斯兰经济思想不断影响着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三是在多元文化与不同经济模式的整合作用下,伊斯兰经济文化将在包容与更新中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如依托牛街清真寺而形成的牛街商业经济文化圈就是在“寺市并存”基础上不断生发、辐射,最终成为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指导下且不断汲取中国传统经营方式而成就的典型的伊斯兰经济文化发展范式,并因百年老店和新型店铺的“围寺经营”吸引了海内外客商,经济文化效应日益趋强。

但“从一定意义上固然可以说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整个全球化进程的经济实质和阶级实质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②亦即,“在利润最大化原则的指导下,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沿着两条主线向全球进行辐射:一条是由商品化而导致的消费主义;另一条则是由市场化而导致的市场主义。伊斯兰与全球化在文化上的悖论实际上集中表现为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悖论。与利益至上的西方经济文化所不同的是,伊斯兰经济文化属于伦理型文化,其伦理价值取向与西方文化存在着较大差异。”^③因此,与其他非西方经济文化一样,伊斯兰经济文化也面临全球化的严酷挑战。鉴于伊斯兰教历来就有教法创制的自我更新机制,可从如下几方面作出努力,推动伊斯兰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深入探究利息理论在现实操作中的变通策略及实施办法。

作为一种宗教伦理型文化载体,伊斯兰经济文化是以具有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深刻的道德烙印、鲜明的福利精神、义利统一与相对均平的思想意识、崇商重商的价值观念以及法律化、制度化、生活方式化等特征的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④为实践前提,在价值取向、经济理念上主要表现为义利并重、群己互利、共同富裕,反对囤积居奇和发放高利贷、提倡等价交换原则、鼓励勤劳致富等^⑤。其中,经训中的利息理论是现代伊斯兰金融和银行体系建立的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资金的正常流通,尤其不利于吸引外企投资,成为伊斯兰经济文化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瓶颈。为此,伊斯兰国家基本上采取“伊斯兰原则和世俗原则相结合的混合策略”,并在继续贯彻平等、公正等基本经济发展原则的前提下,实施无息金融与银行制度并行的变通做法。^⑥其实,“寺市并存”之所以成为伊斯兰经济文化的基本生成模式,从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文化制度本身就具有变通的潜质。

①[英]G·H·詹森:《战斗的伊斯兰》,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页。

②谈世中、王耀媛、江时学:《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232页。

③⑤⑥冯璐璐:《全球化时代伊斯兰经济文化遭遇的挑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4期。

④刘天明:《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特点概论》,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4期。

其次，积极寻求寺院经济融入国家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路径。

“以清真寺为代表的寺院经济将是伊斯兰教最稳定、最具前景的经济类型。随着时间的推移，清真寺在商业上的职能也会日益突出地表现出来，这是和伊斯兰教的经济功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清真寺作为隐性的经济实体，也对经济发展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因此，发展伊斯兰教经济不能忽视清真寺寺院经济。”^①在清真寺聚礼时所培育的“穆斯林皆兄弟”的宗教文化认同感，会延及随后在集市上所开展的经济活动中，伊斯兰经济文化由理念转换为实践的直接产物即为寺院经济，亦即遵循伊斯兰经济文化理念中的基本经济原则，制定相应的经济制度，并借助清真寺的符号性与实践性等文化场域优势，将“伊斯兰精神”贯彻到具体的经济实践当中。伊斯兰教主张买卖双方互惠，把互惠原则视为真主的意志。穆圣说：“主顾双方皆大满意后，才得各干各事”。因为“真主使群众互惠互利”^②。所以，清真寺可否以“互惠原则”为突破口，吸纳多元文化经济理念、构建灵活可行的经济制度并积极探索寺院经济融入国家主流经济的可能，进而探索伊斯兰经济有效融入全球经济的途径。其中，清真寺如何在构建与世俱进的经济文化理念上发挥协调、整合作用至关重要。

最后，充分调动清真寺在伊斯兰经济文化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清真寺既是宣传经训等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的权威平台，也是开展扶贫助弱的慈善经营活动的重要阵地，还是寺院经济的法理经营者。具体表现为：清真寺拥有宣传伊斯兰经济思想的话语权威；清真寺成为伊斯兰经济思想的实践平台；清真寺维系了相对稳定的伊斯兰经济群体；清真寺创造交流信息与提供商机的机遇。因此，清真寺在伊斯兰教“文明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既成为向世界传播伊斯兰文明的核心文化场，也成为建设伊斯兰城市的地标性建筑，更在伊斯兰经济形态的飞跃性变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逐步形成了由伊斯兰经济思想（经训）、伊斯兰经济制度（伊斯兰经济制度和伊斯兰国家经济制度）和穆斯林经济生活等构成的伊斯兰经济。其中，清真寺被称为隐性经济实体，“围寺而居”的穆斯林经济群体为显性经济实体，“寺市并存”则凸现出两种经济实体的依存和互补。在伊斯兰经济面临现实挑战面前，探索“依寺辐射”的全球伊斯兰经济生存发展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空间，充分认识清真寺在伊斯兰经济文化发展中扮演着极为特殊的角色。因为，正是由于清真寺宗教功能与其多重社会功能的相互制动，才不断推动了伊斯兰经济文化体系日趋多元与开放。

（责任编辑：李建欣）

①罗莉：《我国伊斯兰教清真寺经济的现实分析》，《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②参见陈克礼译《圣训之冠》（全五册），台北中国回教协会印行，1988年版。